

三国时代的唐山名将 为何效力江南？

□ 徐满

作为我国古典小说代表“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的故事可以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与之相关的讨论中，话题度最高的莫过于那些身经百战、军功赫赫的将帅们。这些将军里面，也有我们唐山人的身影。不过其中有两位名将，居然效力于千里之外的江南水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说到汉末三国时代割据在江南的一方诸侯，相信大家都会想到建立东吴的孙氏父子三代。而其中开创基业的奠基人孙坚，麾下的四位大将赫赫有名：程普、黄盖、韩当、祖茂。有趣的是，这四位大将之中，居然有一半是唐山人！其中程普出身于幽州右北平郡土垠县，也就是如今唐山市的丰润区；韩当则是幽州辽西郡令支县人，按现在的行政区域则算是一位迁安大

汉。在《三国演义》的故事中，程普被称为“东吴第一员上将”，在赤壁之战时和周瑜并列全军的左右都督；而韩当勇猛过人，曾与周泰联手，恶斗了曹魏第一猛将虎痴许褚三十回合，在夷陵之战时也老当益壮，作为先锋出战。除了家喻户晓的《三国演义》故事，在真实的历史上，程普和韩当的确为东吴的基业立下了赫赫战功，二人同列于著名的“江表十二虎臣”之中。

说到这里，就让人不得不有一个疑问：两位出生在北方大地的猛将，为何会遇上孙坚，并在之后追随他在江南水乡建功立业呢？

关于这点，在史书《三国志》关于二人的传记中并没有提到。笔者查阅了许多

资料，终于在一些其他人物的记载中找到了蛛丝马迹——在《三国志》的公孙瓒传中，曾经提到“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使将之”；而在另一部史书《后汉书》的公孙瓒传中，则提到“中平中，以瓒督乌桓突骑，车骑将军张温讨凉州贼”。这两条记载虽然在年号上存在不同，但却应该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发生在公元184年，韩遂、边章等凉州将领对东汉朝廷发动的叛乱。这一年，汉朝的年号正好从光和七年改元为中平元年。

按照这两条史料来看，为了平定凉州的叛乱，东汉曾经从幽州调集了三千名骑兵前去参战。而日后成为东吴武烈皇帝的孙坚，此时正以参军的身份和诸将

一同作战。从各种资料上来看，程普和韩当很有可能就是在这场战斗中作为幽州的骑兵援军，结识了当时还是基层军官的孙坚。或许是因为一见如故，于是便从此开始追随他征战四方，开创了东吴数代的基业。

两位诞生于华北大地的名将，程普和韩当在汉朝的西部边疆偶遇了孙坚这位日后成为一代帝王的君主，随后又作为威震江南的名将而留下了一个个传说，不得不让人为之感叹。正如《三国演义》序幕的赞诗《临江仙》中描绘的那样：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微虫小物

(二)

□ 于东兴

螻蛄

螻蛄，俗称螻蛄，钻地咬根的害虫。若看到地面鼓起一溜溜浅浅的凸起，那一定是螻蛄在地下穿成的隧道。如发现苗禾打蔫枯萎，多半是这家伙在地下潜行时，咬断根茎的结果。过往大田菜地，被其咬断根茎而至庄稼败死的现象非常普遍。尤其是表土潮湿疏松的盐碱之地，螻蛄串过的地皮，像一道道裸露的青筋，其所经之处，稼禾尽毁。碱地本就不发苗，让螻蛄一闹，缺苗断垄，严重时甚至要毁种。

螻蛄危害稼禾，人人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这家伙却是个小小的歌手。

夏秋之际，田野窗外，蟋蟀鸣声四起，如泣如诉；蝉鸣清音激越，高亢嘹亮；蛐蛐露下彻夜长鸣，俗耳为之一清……在虫儿们的大合唱里，也有螻蛄在鸣叫。螻蛄虽声名狼藉，唱起歌来却不难听，在田野院落隆起的土背里，或是乱石瓦砾下，其“咕咕”声似笙管长笛，细细听去，也有几许清越之音。

人们对蟋蟀、蛐蛐、蝉，甚至蚯蚓的歌唱，都不乏赞美之辞，对螻蛄的鸣叫，却少有人提及，有的多是轻蔑与不屑。如，“听螻蛄叫，就不种地咧？”还有，就是除之而后快的决绝。

螻蛄这个笨拙丑陋的家伙，亦可化害为用。医书上说，螻蛄干粉可入药，治水肿，有利水通便之效。

世上没有绝对无用的东西，有的只是用途尚未被发现而已。

山石鲢

“山石鲢”是陡河里最有名的鱼。色如褚石，长约寸许，通身有黑斑点，面条鱼一样细若无骨，身体却极坚韧，是淡水鱼中的珍品。这种鱼长在上游山水之中，自带山石之色。山洪下泄，成群的山石鲢被激流裹挟，一路南奔，直抵百余里外的草泊。

洪水过后，它们锲而不舍，溯流北上，游向故乡，一路顺畅，但途中一座闸桥挡住了进路。桥在董各庄，名乐善桥，乾隆年间所修，石砌七孔，孔内皆矗丈余高闸板。闸桥是“上河”“下河”分界处。前番闸板吊起，洪水怒泄，上河下河水流无阻。洪水退去，闸板复位，上河下河又形成一丈多高落差。上河水自闸板上直流直下，砸在桥坑上，哗哗作响。这时，鱼儿要想游过闸桥，无疑是在过登天之蜀道。

山石鲢游到闸桥下，面对瀑水，没有胆怯，没有犹豫，而是奋力向上冲刺。有一次我在大桥下玩水，踩着桥坑上湍急的水流，小心翼翼来到闸下。看流水从闸顶下泻，竟发现有许多山石鲢在飞瀑中，一点一点向上游着。瀑布水流有三四指厚，手伸进去，即被击出。可那些小小鱼儿，竟是垂直向上游去，一寸一寸，极慢极慢。有的在瀑布中，一动不动，像一颗钉子钉在那里，只有尾巴急速摆动。那一定是筋疲力尽，无力上顶，暂时悬停于此。但这小小鱼儿绝不后退，而是蓄洪荒之力于一搏——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啊！我不知它们能否冲顶瀑布，越过闸板，游到河水清缓的上游，再游回它们的故乡。

那一刻，我被这小小鱼儿感动了，觉得有一种烈风般苍劲而壮阔的东西涌动在血液里。

小柳叶

谚曰：“小满鸟来全”。农历小满前后，飞往南方越冬的候鸟陆续回到北方，村里村外的柳树杨树上，顿时热闹起来。飞来飞去的鸟儿中，有羽毛金黄的“黄雀”，酷似麻雀的“麻脸”，羽色鲜黄的“黄莺（黄鹂）”，尾巴修长、一飞就“哗楞楞”响的“哗楞楞”……最多的是一种不知防人的小鸟，总是在树梢上跳来跳去。别的鸟见有人来，大都飞走，这种鸟依旧在你头顶上蹦跳。它是南来的鸟儿中个头最小的，连尾羽算起，也就鸡蛋大小，因其羽毛黄绿，藏在树叶间，像一片柳树叶，因此，又叫它“小柳叶”。少时我用弹弓打鸟，打的最多的就是小柳叶。

小柳叶落脚高树枝梢，弹丸射在那些树枝上，只要打不中它就不知飞逃，顶多是跳到附近的树枝上，依旧用柔软的嗓子在唱。

在“除四害”那年，麻雀曾被列为“四害”之一，成为消灭的对象，我们小学生也领到了打麻雀的任务，（交两只麻雀腿为一只麻雀）。麻雀少了，我们就拿野鸟的腿混充，而混充的鸟腿中，多是“小柳叶”。这是鸟儿的悲哀，也是我心中的隐痛。

很久以后，我知道这种鸟叫“柳莺”。每年秋天，柳莺随大批候鸟飞往南方，到越南、缅甸、印度去越冬。万里征程，高山大河，风霜雨雪，它们小小的生命要经历多少苦难！每年春天，又总是不远万里，回到我们身边，带来春的喜悦，夏的绚丽。

其实，飞到我们身边的候鸟，不都这样的经历吗！对它们柔弱而坚强的生命，应深深地感激、尊敬、爱护。朋友们，爱护鸟吧！把天空麦田和柳林留给它们，让它们无忧无虑地飞翔、歌唱吧！

开平的衙门胡同

□ 李树生

开平于唐代武后称帝时设县治石城县，元代设义城。明永乐元年（1403年），开平中屯卫由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移驻滦州西90华里石城废县，开平得名。在封建社会1400年间，虽然各朝各代的官吏在这里设置衙署，但其建筑均无考证。在滦州、滦县旧志书中，对开平历代衙署也无只言片语的记载，只有矗立在那里240多年的衙门胡同所在地，默默地述说着自己的历史。

在开平三街一条与二条的连接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百米小巷。西头是封闭的，东头在1976年大地震前，有一座青砖砌就的巍巍拱门吞吐着来往行人。但见拱门上方悬挂着蓝底白字的

街道名牌上，写着“衙门胡同”4个大字。穿行胡同中，北侧建有10个门口，南北通行的院落长百米，北门口设在三街二条。胡同南侧只有6个门口，因为胡同中间又出了一条向南通向西大街的耿家胡同。胡同南侧几家的宅院有百米长，也是房屋多、院墙高的大院，早年都是富贵之家。

走过衙门胡同拱门，坐北朝南的第一家门牌1号，虽然也是3间正房的院落，但建筑风格与众不同，显然不是普通的宅院。仅大门口就显示出威严肃气派，两扇红漆门，门扇转轴处有狮子狗石门墩相托，门上顶着门钹。登上三级台阶进入门口，距离门口1丈处矗立着一通

影壁，青砖砌垒，青瓦悬檐，散发着其后的神秘信息。从影壁两侧绕过进入一条石砌甬路，直达3间正堂，“正大光明”牌匾高悬。从正堂后门穿过进入二堂，有卧室、书房、会客厅。卧室是官员一人居住的，而不是官员家属居住，因为封建社会的官员不允许在原籍500华里内做官，不是像电视剧里那样家眷随官员赴任。衙门就是开平把总署。听老人们讲“古”，经常提起开平富户刘玺，于嘉靖十五年（1810年）捐资建筑开平把总署。

清朝兵制，凡千总、把总，经制外委所统领的绿营兵都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开平汛设把总，

正七品官员，是清朝兵制最低级军事官员。据《开平区志》记载，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开平把总周起升算起，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历经6代皇帝的106年间，先后曾有21任把总镇守开平。

民国时期，“衙门”变成了“滦州商会丰滦分会”的办公场地。新中国成立后，衙门口出卖给陈、李两家个人居住。1976年地震震坏了房屋建筑，震后由自家恢复建设，但1号院建筑风格大不如200年前，建筑物容颜也失去了当年风采。只有悬挂的搪瓷门牌上依然清晰地印着“衙门胡同”，不时提醒着人们的记忆。

回首来时路 整装再出发

——简述从《救国报》到《唐山劳动日报》的烽火岁月（6）

□ 王烁辉

3. 血腥“扫荡”下的牺牲与坚持

(接上期)

从1942年的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开始，日伪军对冀东根据地的部署极其严密：在围攻“扫荡”前，首先以重兵对冀东基本区构成4条封锁线，挖了两条封锁沟，以此隔断冀东南部与北部山区、东部与西部游击根据地之联系。完成部署后，集中优势兵力，出动汽车、骑兵、自行车队，于夜间奔袭、多路包围，拂晓发起攻击。自4月中旬起，又由“分进合击”改为“辗转清剿”。在清剿区设置许多临时据点，反复包围村庄，搜捕抗日军政人员，屠杀基层干部、抗日军政人员家属、抗日积极分子。

在此期间，区域封锁，消息混乱，许多同志联系不上，牺牲和失踪同志的讯息更是难以获得。但幸存的战士们从未放弃对这些同志的追寻，他们经过半年多的了解、访问，再经过一番伪作真的功夫，终于基本上弄清了布于等同志的牺牲过程。

布于初到腰带山的时候，敌人“四次治强”的凶焰还没有从鲁家峪向四面铺开，环境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他利用这个机会，搜集了很多抗日群众、民兵英雄、拥军模范等英勇斗争的事迹，并且写成文章，以备《老百姓》复刊后相继发表。

5月的腰带山，骤然变得像是4月的鲁家峪，一天清早，被敌人围得风雨不透。布于同另外3名同志被围之后，已经来不及进入事先准备好的隐藏洞，他们决定突围。但是敌人的包围圈太严密了，突不出，只好隐蔽到半山腰的“妈妈洞”里去。这个洞不同于鲁家峪的火石洞，口大，肚浅，但是也有个好处，可以依凭洞口的石头同敌人作战。

布于等人进入洞里，他们的行动无疑已经暴露在敌人眼前。实际上，他们也不是到这里来求生的，而是隐蔽在洞口的石头后面，要同敌人决一死战。众多敌人包围了洞口但不敢进洞，而是找来了山间的柴火、干树枝等，在洞口堆积点燃。烈火燃烧，浓烟滚滚，向洞内吞噬。起初洞内有向外射击敌人的仇恨子弹，到午后则听不到洞内任何声音了。

敌人暂时撤退之后，区里、村里的干部和老乡们冒险来检查山洞，发现了布于等4位同志的遗体。他们的衣服、头发被火烧焦，头脸被血糊住，而枪支仍紧紧地握在已经僵硬的手里，枪膛里没有一颗剩余的子弹。年仅30岁的布于，和几位战友一起，拼尽最后一颗子弹，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滴热血。

那些张牙舞爪的敌人，始终没敢踏进这个英雄的洞口一步，却在洞外扔下了9具可耻的尸体。

同事们沉痛地谈起记忆中的布于：他常常背着一个蓝色的布口袋，内装之物都是《老百姓》报要发的稿件，还有《救国报》其他稿件和布于写的一些古体诗词，也装在这个蓝布口袋里。令人痛惜的是，这些稿件和诗词都和布于的生命与青春一起在烈火中付之一炬了。

布于，一位诗人、散文家，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用他最后的鲜血、火热的青春，从容地、英勇地写下最后一篇威武雄壮却没有文字的散文。

敌人一次次血腥的“扫荡”，给冀东游击根据地和《救国报》社造成了重大损失。除布于外，3位《救国报》元老也牺牲于这一时期，他们是：

创始人之一、刻写组长尹铭钰（又名范捷民），于1942夏，在遵化南部夜明峪突围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说是在遵化平台庄北庄子一带，牺牲于寇寇的机枪扫射之下，时年29岁；

创始人之一、电台抄收员冯国玺（又名杜风），于1942年暮春，在丰润县不幸被寇寇抓捕，始终坚贞不屈，被枪杀于丰润西关，时年27岁；

创始人之一、印刷所所长严德成（又名刘敏），1942年秋，在卢各寨北部遭遇敌人，在躲过敌人昼夜追捕后，因疲劳过度大咯血，不久病故，时年30岁。

鲁家峪遭遇日寇“扫荡”时，还有19位同志牺牲在东峪东山沟车道岭上的一个天然深洞，后来此地被称为烈士洞。

《救国报》7月底复刊后，特别出了两期悼念牺牲同志的专刊，由幸存者每人写一篇悼念已故战友的文章，不论长短，不拘形式，寄托哀思。

分散在各地的同志们见到复刊的《救国报》，如同接到了归队集合的号令，纷纷归来。人手渐多，《老百姓》也随之复刊。

(待续)